

信任的差序格局与民主价值

祁玲玲 赖静萍

内容提要 通过分析 2012 年最新一组数据,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背景下,从家人、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到陌生人,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呈现出逐步递减的差序格局。已有研究者指出,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与民主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基于社会交往同心圆内圈的特殊信任则与民主价值无涉。较高的普遍信任会促进和活跃公民的政治参与,而现有文献中呈现的中国人的高信任度绝大多数来自同心圆的内圈信任,使得信任与民主价值之间因果关系的链接出现断裂。本文的分析是社会资本理论跨文化应用的一次尝试。

关键词 人际信任 民主 差序格局 社会资本

祁玲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210008

赖静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210008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成为横跨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课题,人际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元素,它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成为各国政治学家持续关注的热点。一系列研究证明,信任与一国民主发展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是预测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然而,在诸多大样本分析中,中国作为信任与民主正相关关系的例外^[1],引发了关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对信任与民主关系的反省^[2]。目前西方学者多侧重跨国分析,还鲜有关于中国的信任与民主关系的深入分析,而中国学者在深谙本国信任机制理论的同时也鲜有信任和民主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利用最新的在中国普通公民中一手采样的数据,分析当下中国人际信任的差序格局之现状,及其对公民民主认知与政治参与的影响。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以及南京大学“985”三期改革型项目“中国政治选举研究”(NJU985JD09)的研究成果。

[1]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Fukuyama, Francis. 1995.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6(2):20-33; Delhey, Jan, Kenneth New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2011. “How General is Trust in “Most People”? Solving the Radius of Trust Probl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5):786-807.

义工组织系统信任的制度构建

陈婉玲

内容提要 由慈善信任危机引发的社会不信任环境在客观上遏制了义工组织的发展,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法律形式确立多层次约束机制,以制度形塑义工组织的系统信任,其核心是以监管制度约束义工组织行为,以健全的评估问责机制、明确的社会交代义务增强义工组织信用的可见性和组织的可识别性。

关键词 义工组织 系统信任 制度构建

陈婉玲,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教授 201620

传统的人际信任以道德和价值观为基础,在熟人关系网络被打破以后,共同的道德价值规范面临重建和形成有效约束机制的问题。制度作为博弈的规则是培育和塑造社会信任的基础,尤其是法律制度更是维护和推进社会信任的重要保障。人们“之所以信任他人,是因为相信这些社会机制的有效性”^[1]。法律是社会组织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牢固基础,一个强有力的法治系统会降低交易成本,使信任的风险更低。因此,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规范义工组织运行是义工组织培育社会信任主要途径^[2]。

一、完善政府过程监管,规范义工组织发展

监管是国家(政府)对社会领域实施干预的基本方式,它是特定的国家机构或其授权组织,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社会领域实施管理、控制和引导的一系列制度和行为的总称^[3]。监管不同于管制,监管是基于市场的必要措施,具有契合经济规律或发展规律的相容性和规范性特

本文系 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间义工组织法律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2BFX037)的阶段性成果。

[1]郑也夫、彭泗清等:《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2]约束机制的构建,并不表明取消或者限制组织的自由和社会自治,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组织自由和社会自治。美国学者祖克尔通过对美国工业化过程信任产生机制的变化考察,认为“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人口流动的加剧及企业组织的不稳定等因素导致基于交往过程而产生的信任(process based trust)机制相当混乱,有效性降低。另一方面,由于理性化科层组织的发展、专业资格制度的推广、规章和立法的加强,使得由法制而产生的信任(institutionally based trust)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Zucker,L.G.(1986)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 In B. M. Staw & L. L. Cummings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8, 53-111. Greenwich, CT: JAI Press.

[3]杨道波:《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2 页。

曾国藩的官德修养思想及其现代启迪

江海洋

内容提要 “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清”“慎”“勤”的官德准则,读书、学贤、“日课”、“研几”等修身方法,构成了曾国藩官德修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蕴含着不少闪光点。重温曾国藩的官德修养思想,对于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宝贵遗产”的要求,改进和强化干部的官德修养,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 曾国藩 官德修养 反腐防变 局限性

江海洋,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24

最近,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在当今官德缺失、腐败高发的严峻态势下,弘扬已传承几千年的修身立德文化,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一度被弃如敝帚的曾国藩官德修养思想,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仍不乏中华传统文化的闪光点,不应让其尘封在故纸堆里,而应进行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辩证的而不是片面的、务实的而不是学究式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挖掘其现代意义,对于提高当代干部官德修养水平不无借鉴意义。

一、曾国藩官德修养思想的析论体系

官德修养思想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这是一个历史的范畴”^[1]。而官德修养,则是官员在道德品质、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习惯等方面通过长期的自我反省、自我改造、自我升华和自我超越而达到的一种品质和境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各个思想学派都重视官德修养思想的研究,曾国藩继承儒家思想,博采百家之长,成为中国传统修身文化的典型代表。曾国藩在官德修养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诗文、书信、日记之中。从修身要达到什么目标、符合什么规范、采取什么方法等方面归结曾国藩的言行,我们可以概括和提炼出其独具特色的官德修养思想述论体系。

1. 官德修养的目标追求:志存高远,内圣外王。

儒家认为,一个人要想修身立德,首先要立志,志存高远是修身的第一要务。所以“志”既是自我修

[1]习近平:《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北京〕《求是》杂志 2004 年第 19 期。